

# “塞里絲誤解”的消除 與葡萄牙人的歷史貢獻

華 濤\*



〔地圖1〕托勒密〈球形平面圖〉。原載格勞迪·托勒密《宇宙天文學》，烏爾姆，1482年。轉引自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組織及出版），《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澳門（無出版年代，頁16）

“塞里絲”（Seres）是一個古老的地理名詞。古代歐洲地理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如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學》和他的世界地圖中，談到東亞的北部有一個國家叫“塞里絲”，在“塞里絲”的南面是“秦”（或者叫“秦尼”）。這種誤將完整的東亞大陸一分為二的觀念持續了很長時期，可以被稱之為“塞里

\* 華濤（1952-），中國知名學者，具有上海外語學院（阿語專業）、南京大學（蒙元史研究生）、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之學歷，歷史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副主任。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8屆（2000-2001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提交的研究課題報告。



〔地圖23-1〕安德烈·奧門世界圖：1559年。

（轉引自 Monique de la Roncière et 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Les Portulans: Cartes marines du XIII<sup>e</sup> au XVII<sup>e</sup> siècle*, 圖55）

絲誤解”。〔地圖1〕到了13-14世紀蒙古一元朝時期，教皇派往蒙古可汗的使者卡爾平尼、魯布魯克等歐洲旅行家親身抵達亞洲的東北部，親自得到了關於亞洲東部的可靠消息，甚至將古典時代的“塞里絲”與新時代的“契丹”勘同起來，其後的馬可波羅等也在中國生活過多年，並著書立說，將自己的生活經歷帶回了歐洲。儘管如此，整個歐洲對亞洲東部仍然沒有清晰看法，甚至傳統觀念還會因為新的資訊而得到加強。一直到16世紀上半期，古典的“塞里絲誤解”和表現在“契丹—蠻子”定式上的新“塞里絲誤解”，在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仍然比比皆是。〔地圖23-1、23-3〕

15世紀末人類歷史進入了大航海時代，1487年迪亞斯到達非洲西南端，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1497-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南端到達印度，1519年麥哲倫進行了環球航行。所有這些航行的目的都在於探求從歐洲通往歐亞大陸東部地區的新航路。在上述這些標誌著新航路的開闢和人類認識世界地理新紀元的航行以後，歐洲人對歐亞大陸東部的認識，特別是對中國的認識有了甚麼變化，歐洲對東亞的“塞里絲誤解”是何時消除的，葡萄牙人在這一歷史性活動中起了甚麼樣的作用，是世界歷史上特別是東西交流史上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本課題研究“塞里絲誤解”的發展歷史，並從這一誤解的淡化和消失的過程，研究葡萄牙人在歐洲認識舊大陸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塞里絲誤解”作為西方世界認識東亞的開始並且在西方的長期存在，很早就引起各方人士關注。13世紀當歐洲的使節來到蒙古元朝時，他們就表現出對這一問題的關心。到17世紀當利瑪竇來到中國時，他在給羅馬教廷的報告中也將這一問題作為重要內容加以敘述。然而真正體現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卻還是現代的事情。所以本研究的第一步是分析19

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世界各國學者與這一問題有關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1910年戈岱司出版的《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sup>(1)</sup>，玉爾於1896年編纂、注釋的《中國與前往中國之路》<sup>(2)</sup>，伯希和的豐富研究特別是他在《馬可波羅遊記》注中對“塞里絲”和“秦”(Thinae或Sinae)的起源、發展和爭論所作的長篇總結<sup>(3)</sup>，拉克的洋洋幾百萬言三卷九

冊的《亞洲與歐洲的形成》<sup>(4)</sup>，葡萄牙著名的地理大發現研究者雅依梅·柯爾特桑的《葡萄牙的發現》<sup>(5)</sup>，阿曼多·柯爾特桑的《葡萄牙地圖學史》<sup>(6)</sup>等。在分析這些著述的基礎上，並參考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澳門文化司署和文化局的《文化雜誌》（葡英中三種文字）刊登的許多與地理大發現時代葡人和其他歐洲人在東方活動有關的文章，特別是利用了葡萄牙著名學者阿曼多·柯爾特桑等人編輯出版的《葡萄牙歷史地圖》<sup>(7)</sup>。

本課題承擔者確定了研究“塞里絲誤解”這一歷史性課題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並將整個研究分為三大部分：1）“塞里絲誤解”的產生和發展，主要是在大航海時代前的發展；2）大航海時代開始時歐洲特別是葡萄牙人的東亞知識水平，主要是當時“塞里絲誤解”在歐洲人頭腦中存在的情況；3）葡人東方活動的擴大和葡人在“塞里絲誤解”消解方面的歷史性作用。

### “塞里絲誤解”的產生 及其在大航海時代前的發展

古典時代“塞里絲誤解”的產生和發展，由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玉爾編纂、注釋《中國與前往中國之路》（1896）和戈岱司出版《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1910）而基本清楚。本研究主要是抓住“誤解”兩字，描述它的發生和發展。雖然是誤解，但在古代極東和極西的交往中，這種誤解的產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實際上如果進一步研究，我們會發現更多的“誤解”的例子，不僅有西方對東方的誤解，也有東方對西方的誤解。所以本研究沒有過多地關注這種“誤解”的產生及其原因和背景。本文值得注意的是兩大問題：一是在黑暗的中世紀處於極西和極東之間的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東方知識對歐洲的影響，二是蒙古時代一些親自來到東方的歐洲人對“塞里絲誤解”的影響。

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興起，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被阻斷，西方世界祇能借助於阿拉伯人來認識遠東地區。阿拉伯人繼承了希臘人的地理知識系統，並且與東方有着直接的交往。本課題研究了阿拉伯興起

後與中國的關係，阿拉伯人和中國人相互之間關於對方的記載，特別是阿拉伯人關於東方的地理記載、旅行家的報告等等，強調儘管阿拉伯人對中國的認識還很初步，儘管翻譯成阿拉伯文的托勒密地理著作影響了阿拉伯人，但在阿拉伯人的眼裡，亞洲東部祇有一個稱之為“sin”的中國。本研究中着重研究了三個重要的阿拉伯—穆斯林學者：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伊德里希。

10世紀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al-Istahri）在自己的書中，描述了東方的形勢<sup>(8)</sup>，可以根據他的描寫繪製出一幅東亞政治形勢圖。這個圖表明，在阿拉伯人的記載中，中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在阿拉伯人的頭腦中和描述中，沒有歐洲古典時代的“塞里絲誤解”。

伊本·豪卡勒（Ibn Haukal，10世紀）是巴里黑學派的代表之一，這一學派發展了自己的地圖，其中世界地圖大多是圓形的。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受到歐洲中世紀T-O型圓形地圖的影響。阿拉伯人在繪製圓形地圖的同時，還按照圓形地圖的框架繪製出示意性的地區分圖。在圓形地圖中，比如伊本·豪卡勒的圓形地圖<sup>(9)</sup>，儘管中國的形象與現實相差甚遠，但中國就是中國，在東亞大陸祇有一個中國。

伊德里希（al-Idrisi）出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極西地區北非摩洛哥的休達，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了廣泛的旅行，到過法國、英國、西班牙甚至小亞細亞。伊德里希1154年完成的著作和地圖<sup>(10)</sup>（南上北下），不僅表現出阿拉伯人前所未有的對亞洲的瞭解，而且成為伊斯蘭地理學甚至整個伊斯蘭科學上一個重要成就。在伊德里希的著作和地圖中，中國仍然是一個統一的國度。

總之，阿拉伯—伊斯蘭的地理學和地圖製作，雖然受到古典時代地理學說的影響，但並沒有感染上“塞里絲誤解”，甚至他們的作品還對“塞里絲誤解”提出了某種挑戰。然而，雖然阿拉伯—伊斯蘭的知識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產生和發展發揮了作用，但當歐洲再次興起地理研究的熱潮時，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關心的是如何復興古典時代的知識，

包括“塞里絲誤解”的知識，反而忽視了伊斯蘭地理知識的正確內容。

13世紀初蒙古人在東方興起，統一了蒙古草原以後，先後攻滅西夏、金朝、大理和南宋，並揮師西征，橫掃歐亞大陸。蒙古的戰爭給東西方各國帶來了災難，同時也為東西方的接觸提供了新的機會。

1245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和里昂宗教大會決定向蒙古人派遣使節，勸說蒙古人停止侵犯基督教世界。這個決定雖然十分可笑，但它導致了13世紀東西方的直接接觸，也為歐洲人提供了直接認識東方的機會。會後首先向蒙古人派出的教士是普蘭諾·卡爾平尼（Jean du Plan de Carpini）。他第二年到達和林，受到大汗貴由的接見，1247年秋返抵里昂。我們現在能夠讀到卡爾平尼出使回來後寫給教廷的報告《蒙古史》<sup>(12)</sup>。我們還可以讀到隨卡爾平尼出使的波蘭人班涅狄克脫關於這次出使的敘述<sup>(13)</sup>。卡爾平尼的書是歐洲人根據親身見聞所寫的第一部關

於東方的報道，應該在當時的歐洲有相當影響。

卡爾平尼回來不久，由歐洲派出的使者還有以審溫（Simon）為首的另一個使團去見駐在波斯的蒙古統帥（英諾森四世派出），以教士安德烈為首的出使蒙古汗廷的使團（1248年法國國王聖路易派出），和1253年教士魯布魯克奉命出使蒙古。魯布魯克的出使最為重要。

魯布魯克於1253年底到達和林以南的蒙古冬營地（汪吉河），受到蒙哥的接見。1254年4月，他隨蒙哥返回和林，在蒙古人的都城住了兩個月。6月末，蒙哥交給他一封致法國國王的信，命他回國傳達。次年8月魯布魯克返抵西亞的黎波里，當地的主教不允許他趕往法國去見法王聖路易，而讓他將旅行經歷寫下來，另派人將蒙哥的信轉交法王。我們現在能夠讀到的魯布魯克的《東行紀》即由此而來。

魯布魯克的《東行紀》對蒙古地區的風土人情和他本人的種種活動，都有細膩具體的描寫。<sup>(14)</sup>對於本研究特別重要的是魯布魯克在書中提到了古代的塞里絲：“還有大契丹，我認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塞里絲。他們生產最好的絲綢（該民族把它稱為絲），而他們是從他們的一座城市得到塞里絲之名的。”<sup>(15)</sup>

魯布魯克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將歐洲古代的“塞里絲”勘同於契丹，這在歐洲認識遠東特別是中國的歷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回到法國後不久，羅傑·培根遇見了魯布魯克，詳細詢問了他的旅途經歷和發現，並且將其中的幾乎每個地理細節都載入了自己的名著《大著作》。<sup>(16)</sup>

但是魯布魯克觀點的影響不能被誇大。首先，和卡爾平尼一樣，他的時代是充滿古代知識和神話傳說的時代，他的親身經歷也必然被融入大知識之中，真正消除“塞里絲誤解”的時代還沒有到來。其次，他並沒有明確地放棄古代知識中的東亞分為南北兩大塊的說法。特別是他書中第一次提到的“蠻子人”。魯布魯克筆下的契丹當然是中國，那麼他的“蠻子人”指的是甚麼地方的人呢？他沒有進一步說明。這個“蠻子人”要到馬可波羅的筆下才會變得具體起來。

◀〔地圖23-3〕安德烈·奧門世界圖：1559年。

（圖右邊緣有Serica和China字樣。  
轉引自《地圖集》，vol. II, 圖189E）



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的經歷為歐洲提供了關於中國地理狀況的新資訊。他在中國奉使各地，留下往西南和往東南的行程，同時在描述自己的行程之中，向人們報告了大量中國地名。馬可波羅在書中將大汗統治之地分成三個部分：韃靼、契丹（Catai）省<sup>(17)</sup>、蠻子（Mangi）省<sup>(18)</sup>（有時也稱蠻子國），契丹省和蠻子省的分界即是金、宋的分界。馬可波羅和其他蒙元時代東來的西方人一樣，親自認識了中國，他們記錄下的文字，極大地豐富了歐洲關於東方的知識。但是就歐洲人認識東方而言，馬可波羅的報告卻帶來了相反的結果。馬可波羅報告中的契丹，早已有人報告過，而且魯布魯克已經將它勘同於古代的塞里絲。但是魯布魯克筆下沒有甚麼內容的蠻子，到馬可波羅的筆下則變得相當具體。其實蒙元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儘管蒙古的“四種人”劃分，帶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其中的第四等人“南人”是指中國南方被蒙古人征服比較晚的地區的居民，但是蒙古人在行政區劃方面，並沒有南北之分。現在馬可波羅將中國南方明確稱之為“蠻子”，無形中為古代的“塞里絲誤解”提供了新的土壤。古代的“塞里絲”早已經變成了蒙元時代的“契丹”，古代的“秦”，現在也被馬可波羅變成了“蠻子”。馬可波羅之後東來的西方人還留下了不少記載。鄂多立克大約於1314年開始到東方遊歷傳道的口述旅行經歷和見聞《東遊錄》<sup>(19)</sup>，完全將中國分為兩大地區：北方的契丹和南方的蠻子，其影響僅次於馬可波羅的著作。這樣一個新的“塞里絲誤解”的模式“契丹—蠻子”由此產生，如果再加上北方的韃靼，甚至出現“韃靼—契丹—蠻子”的形勢。新舊“塞里絲誤解”相互加強，對西方的影響很大。

當歐洲人，不論是學者還是普通人，還不具備直接認識遠東的條件時，親身經歷者的報告往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他們的報告澄清了一些古典時代的模糊和錯誤的知識，比如關於絲綢的生產，不再有任何模糊的認識；東方的一些生活習俗，也清楚地展現在歐洲人面前；傳說中的長老約翰，不再可能存在於中國；亞歷山大大帝傳說中提到的遊牧民，不再與蒙古人聯繫在一起。但是這些旅行家都將中國一

分為二。所以古典時代的“塞里絲誤解”在東西交通相當興盛的蒙古時代，得到了新的傳播動力。

## 大航海時代開始時歐洲特別是葡萄牙人的東亞知識水平

15世紀末，世界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但是葡萄牙人在這個時代開始之時對東亞到底有甚麼樣的知識呢？這個問題是本研究進一步展開的基礎，也是闡明葡萄牙人歷史貢獻的前提。所以本部分大致分為三大問題：一是葡萄牙人在這一時期有甚麼樣的航海活動以及航海活動對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識的影響，二是傳統的托勒密地理知識系統對葡萄牙人的影響，三是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的航海活動對他們的東方知識的影響。

葡萄牙人積極的航海活動與兩位重要人物有關：葡萄牙國王堂·迪尼斯（Denis, 1279-1325）和王子亨利克（Infante D. Henrique, 1394-1460）。本課題研究了14世紀早期堂·迪尼斯在威尼斯和熱那亞人的指導下開始的航海活動，以及他們引進葡萄牙的“波特覽”（航海圖）和比較先進的航海技術。“波特覽”的使用是歐洲人航海事業上的重要發展，後來一些世界地圖也或多或少做照“波特覽”進行繪製。<sup>(20)</sup>到15世紀初，當葡萄牙於1411年同卡斯蒂利亞簽訂了和約，擺脫了依附關係，確立了自己的獨立，為自己的發展奠定了民族和國家的基礎之時，葡萄牙人已經在航海方面有了相當的經歷，加上亨利克王子的積極推動，以及曾經征服和統治伊比利亞半島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歷史影響<sup>(21)</sup>，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空前開展。

亨利克王子推動葡萄牙的航海活動是多方面的，包括在地圖製作方面花重金爭取到當時著名的地圖製作中心馬略卡島上著名的地圖學大師雅科梅到葡萄牙工作。雅科梅是1375年卡塔蘭地圖的作者阿布拉昂·克雷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的兒子，曾幫助他父親製作1375年地圖。他於1420年或之後不久來到葡萄牙，不僅幫助改進地圖的製作，而且作為一位地理學家，向葡萄牙人介紹當時關於西北非洲的海岸和內陸的知識，作為一位寰宇學家



弗拉·毛羅〈世界地圖〉(Mapamundi, 1459) (南上北下)  
轉引自<http://www.henry-davis.com/MAPS/Lmwebpages/249.html>.

即世界地圖學家，介紹如何從歐洲經海路前往東方，同時作為一位航海儀器專家，介紹一些航海儀器的製作。亨里克王子的航海活動推動了當時葡萄牙製圖學的興盛。當然，當時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還僅僅限於非洲西海岸或者距離葡萄牙不遠的大西洋島嶼，還沒有到達非洲南端，得到並且能夠提供給公眾和學者的還祇是大西洋航海中的資訊。所以

15世紀的航海活動對歐洲瞭解東方，特別是瞭解亞洲東部的中國，不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而此時歐洲正好重新發現了古代托勒密的地理著作。

歐洲重新直接瞭解托勒密是在文藝復興時期。1406年前後，《地理學》被翻譯成拉丁文，並開始在歐洲廣為流傳。<sup>(22)</sup>《地理學》不僅是當時能夠得到的最詳細最完美的地理學著作，而且是當時人們

熟知的古代希臘最著名的數學和天文學家的著作，所以被時人認為是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最重大的古代珍寶之一。結果雖然托勒密筆下的世界與人們當時瞭解的世界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描述的東方世界不一樣，但許多人在接受托勒密使用經緯線交叉來確定地點準確位置的科學方法的同時，也立即毫不遲疑地接受了托勒密描述的世界。與此幾乎同時，印刷術在歐洲發展起來，並且很快被用於地圖製作，從而推動了托勒密的流行。在托勒密的推動下，古典時代的“塞里絲誤解”不僅重起，而且帶有了科學的基礎。

當然不是沒人懷疑托勒密對大地的描寫。實際上由於歐人早已被馬可波羅等蒙古時代的旅行家告知了許多東方見聞和地理知識，早已讀過曼德威爾的神奇遊記，所以當古典“塞里絲誤解”重起以後，當人們靜下來仔細思考，不得不對托勒密的地圖作適當修改，而且這也被認為是托勒密同意後人做的事。15世紀按照托勒密的製圖方法製作地圖，同時也按照托勒密對東方的描寫繪製東方形象或者“更新”自己的東方知識的地圖學家不少。即便是對托勒密持批評態度的地圖學家，也會在東方問題上跟托勒密走。

本課題重點研究15世紀中期著名的地圖製作者弗拉·毛羅的圓形世界地圖。毛羅地圖上的亞洲主要吸收馬可波羅的知識，甚至被時人認為“改進了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的地圖”。他是第一位在歐洲製作的地圖上標出了“蘇門答臘”。他在地圖中還標出了“isola de Zimpagu”（日本島）。雖然位置並不正確，但這是西方地圖中第一次提到日本。佛拉·毛羅圖上的中國，中國城市和許多注解，甚至城市外畫出的某個人物，大量取材於馬可波羅，但卻不同於1375年的卡塔蘭地圖，一是中國的海岸線被一些細長的海灣分割，另一點是中國的兩大河流長江和黃河有了比較合理的描寫，而不再像卡塔蘭地圖上，中國的水系以汧八里為中心而流向東南。（見毛羅地圖及示意圖）毛羅地圖留給人們的最大遺憾一是南亞和東南亞的面積過大，大得與現實完全不一樣。然而考慮到當時人關於東方的有限知識，這應該可以原諒。第二大遺憾是他當時實際上沒有能夠從葡萄牙人那裡得到關於非洲的最新資訊。葡萄牙人當時的戰略是

向外人保守一切與航海發現有關的情報，以免引起競爭者的胃口。“保持緘默的協定”是歷代葡萄牙政權的一貫政策。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發，當我們根據地圖研究當時歐洲人的東方知識時，我們一定要注意研究地圖的反映和人們實際知識之間的差距。特別是到16世紀，當葡萄牙人實際上已經在東方有相當多的活動並已經瞭解了許多情況時，他們的地圖卻仍然保留着許多相當原始的資訊，我們大概不能由此得出他們關於東方的知識仍然相當落後的結論。

總之，15世紀是一個內容豐富的世紀，航海活動的擴大，地圖科學的發展，古老知識的繼續，都為葡萄牙人在新世紀的貢獻，埋下了伏筆。

1481年葡萄牙國王諾昂二世即位以後，葡萄牙的航海活動得到了新的推動。迪亞士於1487年8月啟程向南航行，並於1488年初繞過了好望角。這是葡萄牙人一個世紀以來沿着非洲西岸航海的目標所在，也是他們在15世紀中期得到弗拉·毛羅地圖後的信仰所在。現在他們終於可以自豪地宣佈自己的地理觀念的正確。同時，葡萄牙國王派出達科維良從陸路前往東方。達科維良和他的同伴德派瓦於1488年春天離開開羅，穿過蘇伊土地區，乘船沿紅海南下，到達亞丁，再轉乘阿拉伯人的船，到達印度古里，然後又轉往果阿，並去了霍爾木茲。達科維良返回開羅後，見到了葡萄牙國王派來的使者，請他們將自己的信件帶回葡萄牙，報告在印度和非洲東海岸的見聞。達科維良的這份秘密報告沒有能夠流傳下來，所以我們不知道達科維良有沒有談到亞洲東部包括中國的情況。按理說，當時在古里和霍爾木茲活動的商人中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即使他沒有遇到中國商人，他也應該聽說許多商品來自亞洲東部的大國。達科維良的航行和迪亞士的航行一樣，為葡萄牙人瞭解東方，瞭解前往東方的道路，奠定了基礎。15世紀末達伽瑪的航行就是建立在他們獲得的知識之上的。

15世紀末歐洲人開始探求從歐洲通往歐亞大陸東部地區新航路的努力非常大，但當時他們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有兩種不同的地理認識。一個代表是葡萄牙人的沿非洲西海岸向南的航海活動，另一



〔地圖8〕坎迪諾地圖（作者不詳，約於1502年） 轉引自《地圖集》，vol. I, 圖4.（彩色單頁）

個代表是西班牙人的橫跨大西洋的西向航海活動。1492年8月，哥倫布帶着後一種思想，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援下，率艦隊西航。經過在大西洋上的艱難曲折，10月12日登上了巴哈馬群島的瓜納哈尼島，1493年初返回西班牙。哥倫布雖然成功地西航和返回，但他當時認為自己向西航行的目的地是印度，最後到達的也是印度，他將自己遇見的和帶回的土著居民當作印度人。這個“印度”是當時歐洲人對亞洲南部和東部的通稱。<sup>(23)</sup>

哥倫布到達“印度”震動了全世界，並引起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的爭執，雙方在托德西利亞艱苦談判，並於1494年達成了〈托德西利亞條約〉。就本研究而言，這份條約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反映出葡萄牙人內心的地理觀念。實際上他們懷疑哥倫布西航確實到達了“印度”。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繞過非洲南端東航亞洲的想法。所以當時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爭論的不是要西班牙人放棄西航的權利，而是爭取將分界線移向更西之處。<sup>(24)</sup>葡萄牙人關於整個地球大小的看法，特別是關於歐亞大陸東端的整體看法，顯然是正確的。這種基本地理觀念的正確，反映出葡萄牙人在地理學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而後來瓦斯科·達伽瑪率艦隊成功地繞非洲南端東航“印度”，正是葡萄牙人地理觀念的驗證。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西航主張的擁護者西班牙，還是東航主張的支持者

葡萄牙，當時歐洲人對東亞的認識都相當原始，他們的東亞觀仍然建立在馬可波羅時代的知識上。但是葡萄牙人到達亞洲和他們在亞洲的活動，對當時歐洲的東亞觀開始產生革命性的衝擊。

探討葡人在印度洋和南亞的航海活動對當時地理知識的影響，主要依靠對1500年以後的各種地圖的研究。早在1500年，達伽瑪的航行就被胡安·德拉科薩（Juan de la Cosa）記錄進自己的世界地圖中。德拉科薩曾擔任哥倫布的舵手，航海知識豐富。他的地圖中印度的形狀截短了一節，東南亞出現兩個過長的半島，並且托勒密地圖中的大中國灣又再現出來。但在印度之上有一段文字，說明印度是葡人發現的。到1502年所謂的“King-Hamy-Huntingdon Chart”，東方知識反映得更加清楚明確。例如古里已經清楚地畫在印度西海岸。<sup>(25)</sup>進一步表現出葡人對亞洲的瞭解的是1502年完成的著名的坎迪諾球形平面圖（Cantino Planisphere）。當時葡萄牙有一幅高度機密的官方世界地圖〈Padrão〉，每當葡人在海外航行回國後，政府即將航海所得到的地理情報，繪製進該圖。坎迪諾地圖至少部分複製了葡萄牙的這種官方世界地圖。<sup>〔地圖8〕</sup>

坎迪諾地圖上畫上了許多最新的葡萄牙人航海所得的資訊，特別是關於遠東和極西地區的資訊。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始終沒有在意，雖然此圖上

亞洲東部已經完全不同於托勒密的框架，亞洲大陸以東不再由一個封閉的大陸所環繞，而是一個敞開的大洋，但此圖在東亞大陸，也就是中國大陸的海岸線的頂端，畫有一條很短的向東方的海岸線。這條海岸線雖然不長，但似乎意味着作者尚未完全拋棄，或者他尚不敢完全拋棄托勒密的學說。葡萄牙人當時的東方航行還沒有越過印度次大陸，他們關於東方的知識還相當有限。除了宏觀認識之外，地圖上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一些說明值得注意。<sup>(26)</sup> 圖上的這些說明，仔細想一想，似乎與《諸蕃志》、《島夷志略》等等中國史籍中的記載有某種相像。不過圖上提到的遠東地名和關於遠東的說明，表明當時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尚少。改變這種局面必須依靠親身生活的經歷和根據親身經歷而向歐洲傳達的知識。

與坎迪諾地圖同源的或者根據坎迪諾地圖畫出的還有“Caveri 地圖”(Canerio)。坎迪諾地圖和 Caveri 地圖對其後四分之一世紀裡歐洲地圖的發展有相當影響。

### 葡萄牙人東方活動的擴大和葡萄牙人在“塞里絲誤解”消解方面的歷史性作用

達伽瑪從東航印度返回之後，葡人開始有計劃地在印度洋展開自己的活動，建立在印度洋上的霸權地位。他們在印度洋沿岸各地的活動受到當地居民的抵制甚至武裝抵抗。葡憑藉自己優勢的武器和嚴密的組織力量，打敗當地的軍隊。他們往往採取殘酷的手段，爭取自己的利益，表現出殖民者的野蠻本性。但是葡萄牙在印度洋和南亞、東南亞的活動為歐洲人認識東方特別是亞洲南部，創造了條件。本部分首先研究葡人在印度洋和南亞、東南亞的活動對葡萄牙人東方知識積累的影響。

自1500年卡布拉爾率領達伽瑪之後的第一支葡萄牙艦隊東航印度，各種葡萄牙艦隊先後在印度洋和南亞活動。當時連續派遣船隊東航以及在印度常駐船隊和軍隊，為葡人瞭解東方提供了便利。在16世紀的最初幾十年裡，在東方活動的著名葡人有1509年率領艦隊抵達馬六甲的迭戈·洛佩斯·德·塞奎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長期擔任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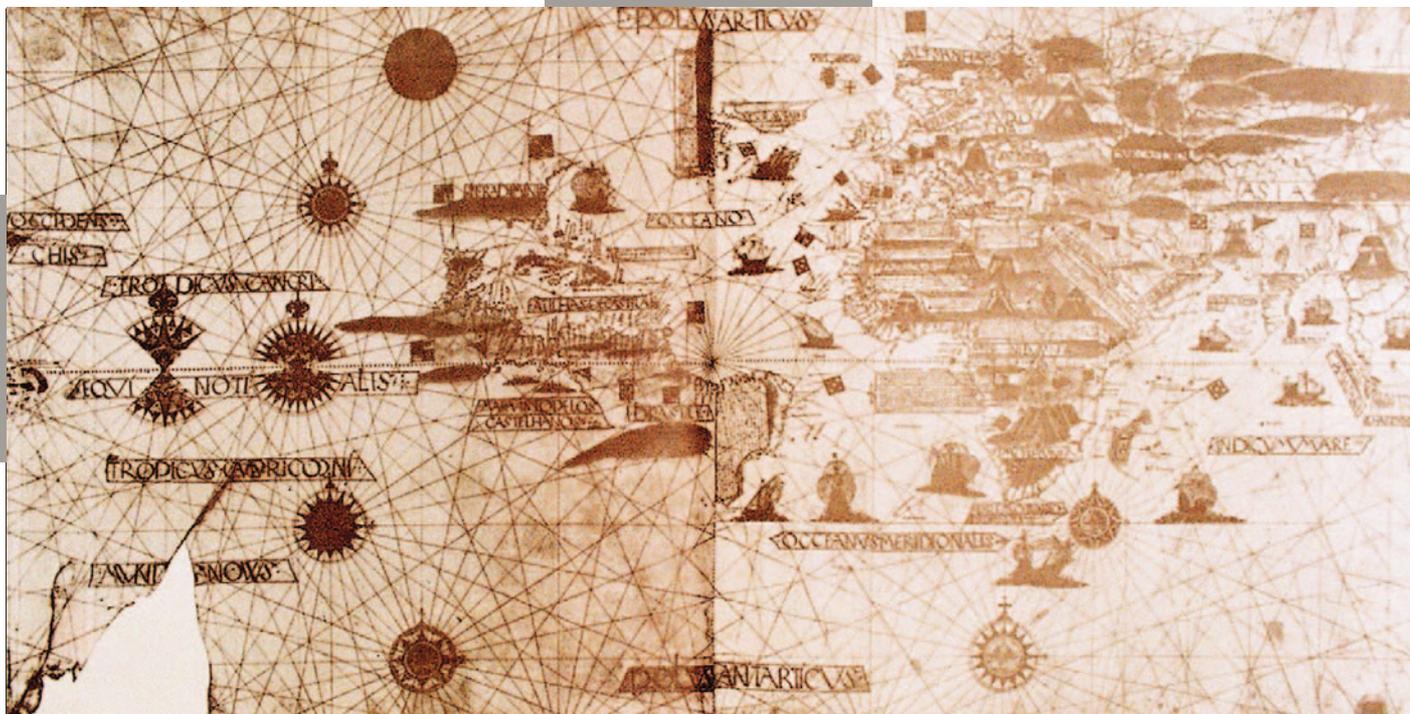
總督同時手段非常殘酷的但在葡萄牙大發現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阿爾布克爾克，以及為西班牙服務的進行環球航行的葡人麥哲倫等。葡人以及與葡萄牙有關的人員的東方的活動，對他們的地理知識和地圖製作有很大的影響。可以說，葡人在海外向前推進的每一步都會在他們的地圖上反映出來。這種反映在以下一些地圖上一步一步表現出來：

最早表現地理知識進步的1510年的一幅葡萄牙地圖<sup>(27)</sup>、第二批反映地理知識進步的羅德里格斯的地圖<sup>(28)</sup>、進一步反映葡人在印度洋和南亞、東南亞活動的雷內爾地圖，包括“未署名的佩德羅·雷內爾海圖：約1517年”的地圖<sup>(29)</sup>、“未署名的佩德羅·雷內爾海圖：約1518年”的地圖<sup>(30)</sup>、“未署名的若熱·雷內爾的平面球體圖：1519”部分<sup>(31)</sup>。(地圖12)

不過當時關於東方的地理知識還沒有成為確定無疑的知識，換句話說，歐洲人關於東方的地理知識正處於轉變階段。任何新知識都會受到重視，都會在與舊知識比較之後加入到人類的知識系統中去，佔據某種位置，並在地圖上表現出來。舊有的知識還沒有到被清除的時代。所以16世紀初期，當葡萄牙人在用自己的航海實踐來修改地圖中的某些傳統描寫時，歐洲的風氣是修訂和改進托勒密地圖，而不是推翻托勒密重繪世界地圖。這些行動表現出的想法是，既不完全否定托勒密，又利用新知識去修正他。但是托勒密對東亞的基本看法，即所謂的“塞里絲誤解”，在這種修訂之風中，很難有根本的改觀，甚至我們後面要研究的16世紀中期的一些相當出色的葡萄牙地理學家和地圖繪製家，也不能完全擺脫托勒密。

總之，在地理大發現的知識不斷傳回歐洲之時，以托勒密地圖為藍本的地圖繪製是一些地圖家的做法。這種做法使得“塞里絲—秦國”定式或“契丹—蠻子”定式為主要內容的“塞里絲誤解”也被繼承了下來。完全消除托勒密的框架不僅仍需時日，而且要走另一條道路。

本部分研究的第二大問題是葡人的活動向遠東伸展及其對認識東方的意義。研究者希望通過對葡人地圖上關於東方描寫的研究，回答葡人認識東方



〔地圖12-1〕(上)〈未署名的若熱·雷內爾的平面球體圖：1519部分〉(轉引自《地圖集》，vol. I 圖12)

的水平和傳統的“塞里絲誤解”的發展問題。

葡人在南亞站穩之後必然進一步向南亞以東發展。現存最早關於葡人接觸到中國人的資訊，是在1500年卡布拉爾船隊抵達古里不久的事情。

本部分簡要研究了16世紀早期葡萄牙與中國的關係，包括1508年受國王派遣率艦隊前往馬六甲的迭戈·洛佩斯·德·塞奎拉、擔任印度總督的阿爾布克爾克、1513年作為商人伙伴在中國商船隊中前往中國的第一位葡萄牙人阿爾瓦雷斯、受馬六甲司令派遣前往中國的拉斐爾·裴瑞斯特瑞羅(Perestrello)、1516年2月新任印度總督派往中國的由費爾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領的艦隊、費爾隆船上的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和他的《東方概要》、多默·皮列士被允許前往北京和費爾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和廣州地方官建立的友好互利關係等等，以及此後中國和葡萄牙關係的一波三折。不過對於本人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從此葡萄牙人得以從近處觀察中國，獲得有關中國的資訊。這些資訊包括葡萄牙官員、將領從東方特別是中國“前線”向國王的匯報和通信，以及在“前線”活動的一些人的個人材料。在這些材料中，中國不再是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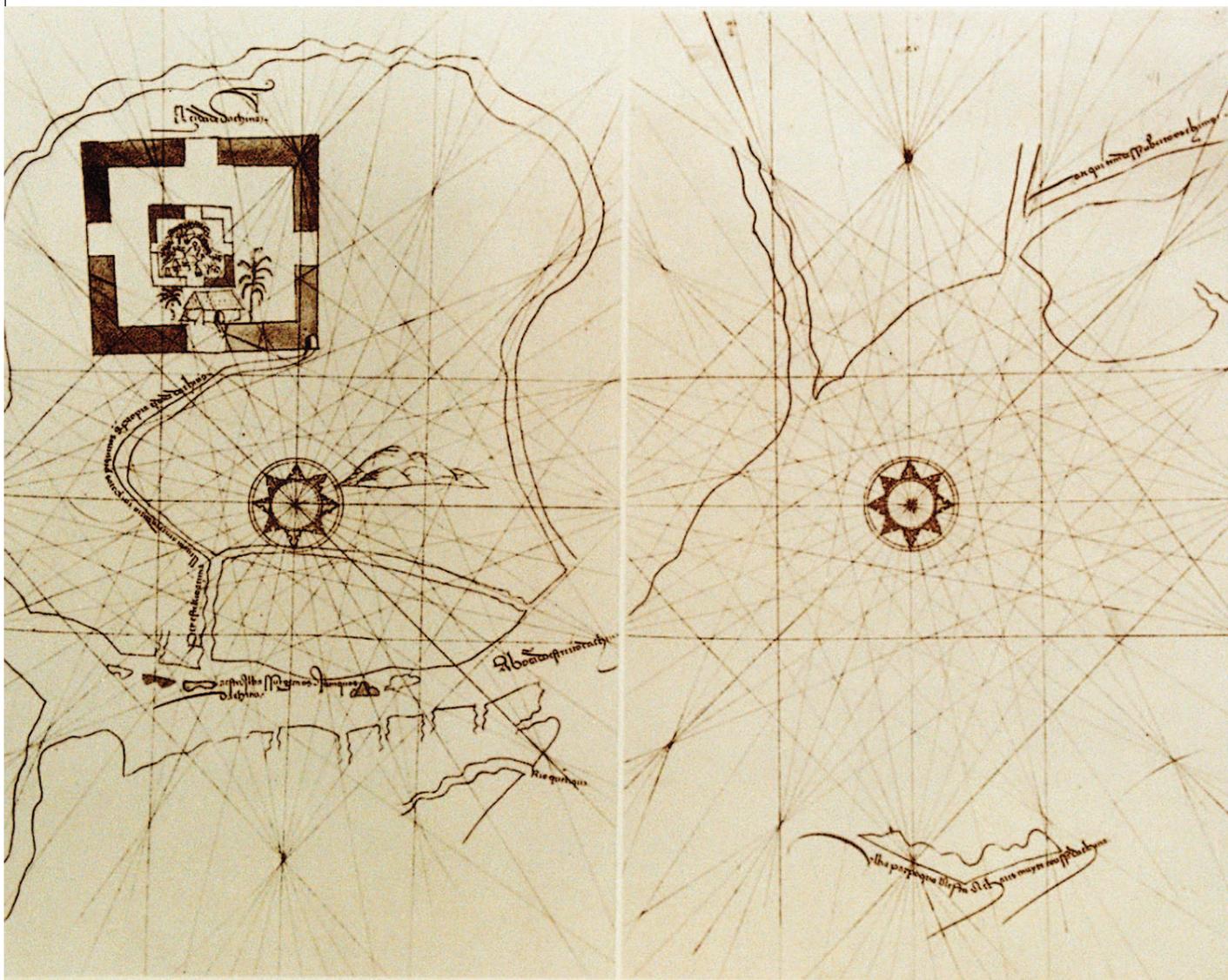
和“蠻子”，或者說不再單單是傳統的“契丹”和“蠻子”，中國的一些活生生的情況，從這些親臨中國的人士的口中筆下傳達給歐洲人。雖然這些往往是不完整的資訊，往往並不能從根本上推翻傳統認識，但它們使得歐洲人進一步瞭解中國，對歐洲的“塞里絲誤解”的消除有重要意義。

葡人在中國“前線”瞭解的資訊很快就反映到地圖上。我們發現羅德里格斯的地圖和他的《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他在地圖中多次使用“China”這個詞。他的《書》中有一段關於前往中國的航路，該段落的葡萄牙原文為 *Camynho da Chyna*，英文翻譯為 *Route to China*。<sup>(32)</sup> 他在《書》中還包括了幾幅中國地區草圖<sup>(33)</sup>，即〈東京灣圖(包括海南島在內)〉、〈中國南方沿海部分地區，以及一些島嶼，可能是菲律賓〉、〈廣州河河口以及可能是北京城〉、〈中國東北海岸，以及一個稱之為 *Parpoquo* 的島嶼，很可能對應為日本〉、〈應該是臺灣的島嶼〉。<sup>(34)</sup> 羅德里格斯在圖中多處使用了“*da China*”這樣的字樣，包括〈廣州河河口以及可能是北京城〉中的“*A cidade da China*”(一般認為可能是北京)。  
〔地圖11-1〕羅德里格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難題：這裡的“*da China*”是他關於中國的名稱的固定用法嗎？特

別值得注意的是，與他同時期的人多默·皮列士在《東方概要》中使用的中國的名稱，並不都是 China。多默·皮列士書中的中國名稱有幾種寫法：chys, china, chijs, chijna。其中 china 一詞在 1502 年坎迪諾地圖中可以看到它的類似寫法“Chinacochim”（Cochin-China）。我現在不能解釋這段時期中國名稱變化的原因，但我們在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中看到他對“china”一詞的使用非常執著，這與同時期的多默·皮列士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這一名稱的使用在不久的將來將普遍推廣。所以羅德里格

斯對中國的稱呼，假如當時是一種偶然，那麼這種偶然對後來人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而歐洲傳統“塞里絲誤解”中的中國的名稱在這種偶然中，不經意地被排除了。

本課題還分析了羅德里格斯和雷內爾父子之後體現出東方活動對地理知識影響的迪奧戈·里貝羅（Diogo Ribeiro）的地圖。<sup>(35)</sup>從 1525 年到 1532 年期間，里貝羅繪製了大約五幅平面球體圖。<sup>(36)</sup>這些圖繪製精美，圖上的地理描寫比起他之前的羅德里格斯和雷內爾父子的圖，有了不小進步。圖上的從



〔地圖11-1〕羅德里格斯地圖 1. 珠江口一帶；2. 中國東北沿海一帶。（轉引自《地圖集》，vol. I 圖36）



〔地圖17-4〕〈里貝羅地圖：1529年（Weimar）〉（轉引自《地圖集》，vol. I 圖40）

錫蘭往東到中國廣州的整個海岸線，都相當精細，也已經比較準確。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馬來半島和馬六甲以東，中南半島的形制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比較接近實況。有學者認為，葡萄牙人在1514年已經到達中國，但里貝羅的地圖上對此沒有甚麼反映。<sup>(37)</sup>實際上從里貝羅1525年一幅、1527年一幅、1529年兩幅地圖上關於東亞的描寫上看，他的知識在一步一步地增加，描寫也越來越詳細。另外，雖然我們沒有材料證明他讀過羅德里格斯的《書》，但里貝羅的幾幅地圖上中國的稱呼，似乎與羅德里格斯有某種聯繫，其變化值得注意。在他的1525年圖上，中國的名稱是“LA CHINA”，在他的1527年圖上，中國的名稱是“LACHINA”（沒有間隔），在他的1529年圖上，中國的名稱是“CHINA”，在另一幅1529年圖上，中國“CHINA”的名稱上還有一些說明文字。<sup>(38)</sup>雖然1532年的地圖上再次出現“LACHINA”字樣，但里貝羅逐步使用“china”一詞的傾向，還是很明顯的。里貝羅地圖對歐洲其它國家影響很大，這可能是“china”一詞推廣開來的原因。<sup>〔地圖17-4〕</sup>

從里貝羅1533年8月去世，大約二三十年間，葡萄牙人在地圖上沒有甚麼大的表現。例外之一是成圖於1535年的一幅地圖。這幅地圖原本沒有注明繪製人和繪製日期，根據阿曼多·柯爾特桑的考證<sup>(39)</sup>，特別是根據圖上的用語，它被確認為葡萄牙人的作品，並且它應該繪製於1535年左右。拉克研究後認

為<sup>(40)</sup>，它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反映出葡萄牙人東方地理知識進步的地圖，其重要表現是對菲律賓和渤泥的細部描寫。除此以外，我認為這幅地圖關於遠東和中國的描寫也值得一提。這幅圖上的地名很少，僅在一個河口（顯然是珠江口）有一行字：“Rio de catam a china”。與1529年里貝羅地圖上珠江口一帶標注了不少地名的情況相比較，似乎沒有進步，反而有所倒退。但在地圖上東京灣一帶，一個尖的海角的下方，有一個海島。它應該是海南島。雖然海島的形制不對，呈現出南北伸展的尖細形狀，但它的出現，在葡萄牙人甚至歐洲人的東方地圖史上具有意義。這是海南島第一次以比較準確的方位出現在歐洲地圖上。而到16世紀中期，海南島則成了歐洲地圖上比較普遍的內容，其形制也有了改進。這幅地圖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有開山之功。

葡萄牙人的地圖製作，在里貝羅之後似乎有一個沉寂期。葡萄牙人與中國的第一次正式官方接觸於16世紀20年代初失敗後，葡萄牙人到東亞的正式活動相對減少。這可能是現有記載，不論是文字的或者是地圖的，也相對較少的原因之一。但是葡萄牙人在中國失敗後，並沒有退縮回馬六甲，相反，他們根據自己早先的經驗，避開廣東，北上閩浙，與當地人進行私下貿易。

在1529年里貝羅的地圖以後，洛博·奧門的1554年地圖是下一個有明確日期和作者的葡萄牙人繪製的世界地圖。洛博·奧門（Lopo Homen）是葡



間相對位置，到16世紀中期，基本上趨於完善。在這種大體完善的背景下，一些細節也日益完善。

第二是地區分圖的繪製日趨準確。地區分圖的出現應該相當早，因為較小地區的情況容易被人們認識和掌握，較小地圖的繪製也比較容易。這些地區分圖比較起世界圖，對新的航海知識的吸收更加容易，也更加容易擺脫傳統知識的影響和束縛。地區分圖的製作一直持續下去，後來又得到地圖集製作和出版風氣的新推動。

第三是16世紀中後期的葡萄牙人地圖中仍然包含有傳統的知識。實際上在我們分析並且給予很高評價的地圖上，都有傳統知識的內容，特別是一些古典地名仍然被標注。除了三位奧門的地圖，其他地圖學家的地圖上也存在這種情況。

我曾經假設安德烈·奧門1559年的地圖是“塞里絲誤解”的最後代表。現在1559年的結論是不是要修正？如果修正1559年這個具體年代，如何認識整個16世紀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活動和他們的地圖的關係呢？如何認識地圖上的整體性進步和傳統知識並存的現象呢？進一步說，傳統的塞里絲誤解的消失應該確定在甚麼時候，並且與葡萄牙人有甚麼關係呢？本研究的最後一部分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思考。

本研究認為，人類認識地球上各個地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便在今天，我們也不能說已經認識了全世界所有地區，特別是一些內陸地區。在整個16世紀，通過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活動，歐洲人對遙遠地區的傳統認識和描寫有了很大的改觀。這種改觀，除了“新大陸”美洲、澳洲等，在對舊大陸的東亞地區的認識上表現得非常明顯。葡萄牙人率先親自來到南亞、東南亞、東亞和東北亞，古典時代封閉的東亞大陸已經開放，東南亞和東亞的基本輪廓已經清楚並基本準確，東亞大陸上的“塞里絲”和“秦”、中世紀的“契丹”和“蠻子”，在大多數與中國有關的地圖上，特別是具體的地區分圖上，已經不再存在。雖然對中國的描寫仍然相當粗糙，但到16世紀50年代，葡萄牙人已經基本上繪製出中國的海岸線，葡萄牙人地圖上的中國的輪廓已經和實際上的中國在大的方面，相差不多。在這樣的海岸

線上，已經沒有“塞里絲”、“契丹”、“秦”和“蠻子”存在的餘地。

但是在東亞大陸上，仍然有許多不為歐洲人所知的地方。實際上，當時除了海岸地區之外，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人一樣，對中國內陸地區基本不瞭解，更不用說所謂的西部、北方等邊遠地區。對於這些知識空白之地，16世紀特別是16世紀中期以後的製圖學家大致採取兩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將這些地方空着，不劃任何東西。在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期的各種球形平面圖即世界圖和地區分圖中，相當部分作者是採用這種做法。本研究引用了一些地圖證據。當時大部分亞洲的內陸地區尚未被歐洲人認識，所以圖上的內陸地區大部分空着的話，不僅顯得作者的知識有限，而且看上去也不漂亮。主要的解決辦法，並且可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空着的地方畫上一些裝飾，可以是樹木、動物、人物等，也可以是建築物或者城市。這種做法早就可以在葡萄牙人的地圖上看出。如1580年成圖的費爾南·瓦斯·杜拉多的地圖集中，南美洲大陸的內陸地區畫的是人物和動物，而西北非內陸畫的是騎馬的穆斯林等圖案，東亞中國則畫的是寶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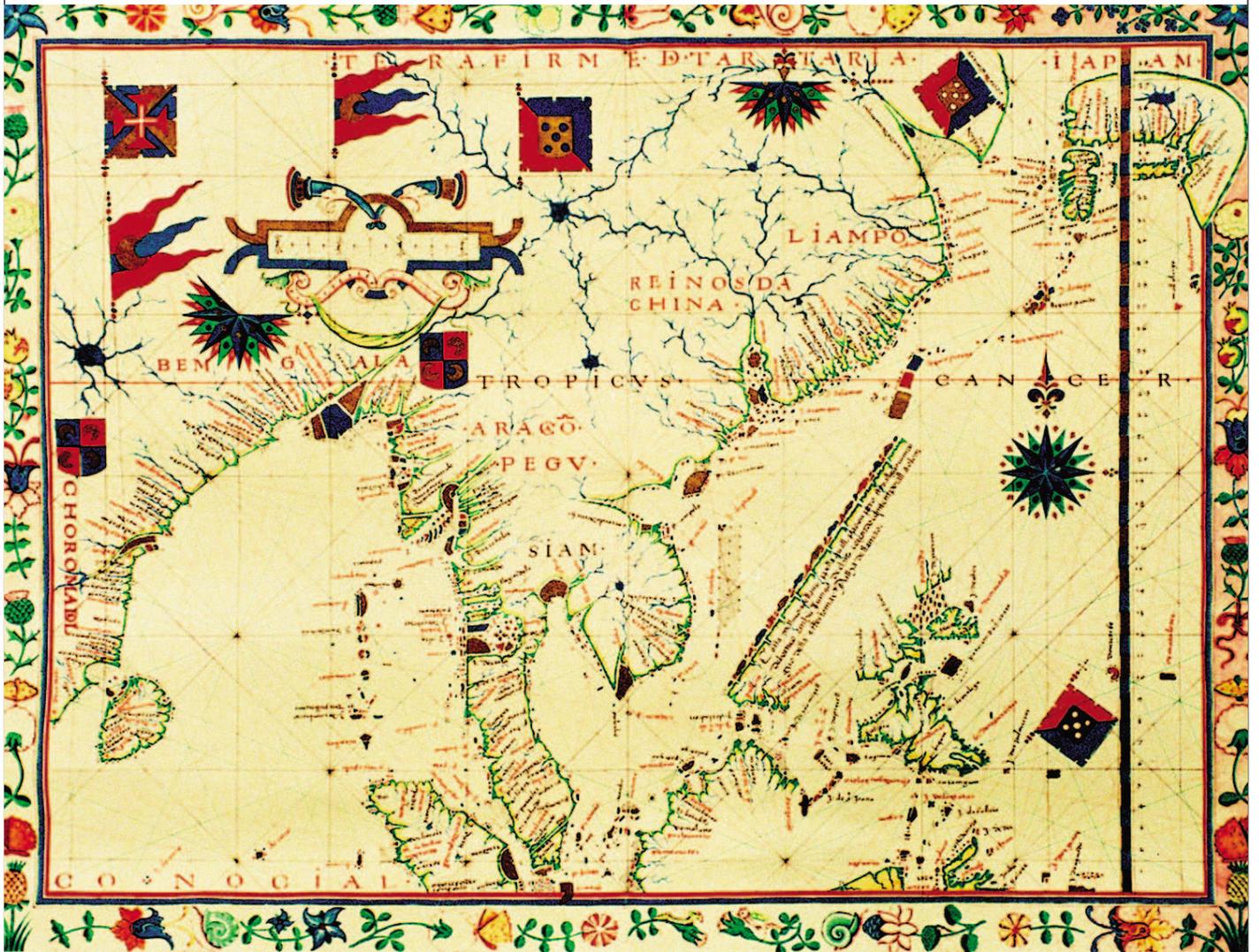
第二種態度是在圖上空白之處填補內容。但當時地圖繪製者所具備的知識，或者來自古典時代的作家，或者來自中世紀的旅行家，而這些作家和旅行家對東亞和中國的瞭解，祇能是一些帶有“塞里絲誤解”的知識。將他們的知識反映到地圖上當然會出現安德烈·奧門1559年地圖上契丹、塞里絲並存的局面。實際上到16世紀中期，葡萄牙地理學家們已經不再將東亞看成南北分立為兩大地區的東亞。他們製作大量的地區分圖就是最好證據。但是對於比較內陸的地區，他們無法得到新的知識。甚至16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地圖學家墨卡托也抱怨說無法得到關於東方的新的地理知識，不得不繼續使用馬可波羅和古典時代地理學家的知識來繪製東亞地圖。<sup>(46)</sup>總之，試圖在地圖空白處填補內容的做法和當時能夠得到的知識，決定了按照這種做法繪製的地圖，不能不出現傳統的知識內容，包括古典和中世紀的地理名稱。所以儘管傳統的“塞里絲誤解”的內容

在地圖上還會有表現，但它代表的意義與早先已經完全不同。不能認為“塞里絲誤解”仍然在繼續。

另外，我們在16世紀中期和後期，甚至17世紀，還看到一種含有“塞里絲”知識內容的地圖。這是一種安排在地圖集最前面的世界圖，有時也放置在其它位置。前面討論過的迭戈·奧門1558年地圖集和1568年地圖集中的世界圖，就是一個例子。巴托洛梅烏·維利烏1568年《宇宙誌圖集》中的地圖<sup>(47)</sup>也是一個例子。而到16世紀末和17世紀，這樣的例子就更多了。這是一種示意性的圖幅，是為了讓讀者大致瞭解全世界的情況。在這種圖幅上出現的帶

有古典或者中世紀色彩的內容，主要是地名，並不能說明作者仍然帶有“塞里絲誤解”的地理認識。在他們的地區分圖中根本看不到那些古典或者中世紀色彩的內容。所以示意性的圖幅大概算是一種歷史性地圖。本研究設想，這種地圖集首頁的描寫方法，似乎可以在17世紀後期朝鮮半島的〈天下圖〉上看到蹤影，而且很可能與西方地圖作品傳入朝鮮有關。<sup>(48)</sup>如果確實有關係，這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證當時歐洲的地圖繪製思想。

總之，到16世紀中期，當葡人的地圖製作達到高潮，當具體的地區分圖大量問世時，我們不能再



〔地圖30〕費爾南·瓦斯·杜拉多：1571年。（轉引自《地圖集》，vol. II 圖284）



〔地圖31〕Luís Jorge de Barbuda〈中國圖〉（約成圖於1575）。轉引自《地圖集》，vol. II 圖239A。

認為“塞里絲誤解”仍然存在。歐洲人關於東亞地區一分為二的地理認識及與這種一分為二的認識相結合的地理名稱，都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16世紀50年代以來，葡萄牙地圖學家向讀者提供了大量明確標注“中國”或者與中國有關字樣的地圖：1560年，巴托洛梅烏·維利烏，約1560年的地圖集中的中國南方沿海地名眾多的遠東圖；1563年，拉扎羅·路易斯（Lazaro Luís），1563年地圖集中的“中國”標注清晰、並注明“廣州”（Camtão）的遠東圖<sup>(49)</sup>；1565年，塞巴斯蒂安·洛佩斯，注重廣州城（Cidade de catao）的、中國北方標注“韃靼”（Tartaria）的中國圖<sup>(50)</sup>；1568，迭戈·奧門，1568年地圖集中的中國圖；1571年，費爾南·瓦斯·杜

拉多，1571年地圖集中標注“中國”（Reinos da China）並帶有“Chinche”（“漳州”）和“Liampo”（“寧波”）的地圖<sup>(51)</sup>〔地圖30〕；1590年，巴托洛梅烏·拉索，1590年地圖集中的珠江口清晰、標注有廣州城（Cidade da cantão）的中國地圖<sup>(52)</sup>；甚至在1575年還出現了一幅專門的單獨的中國圖（Luís Jorge de Barbuda, c. 1575）。<sup>〔地圖31〕</sup>

這樣，我們應該可以斷定，在葡萄牙人的地圖中，傳統的“塞里絲誤解”至此已經被新的地理資訊所取代。葡萄牙人的地圖反映出的歐洲人的東亞地理知識已經比較接近現實。至於具體的年代，考慮到1559年安德烈·奧門地圖和1561年巴托洛梅烏·維利烏地圖的情況，我們大致可以認為，1560年前

後是傳統的“塞里絲誤解”最後存在的年代。

當然，東亞地圖中不再反映“塞里絲誤解”，說明葡萄牙地圖學家，根據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活動的葡萄牙人得到的第一手資訊，從自己的頭腦中消除了傳統的“塞里絲誤解”的影響。但歐洲人，不僅是地圖學家，而且是廣大公眾，能夠真正認識東方的亞洲，那還需要時日，至少還需要等到大批來華的耶穌會士將自己在中國生活、傳教的親身經歷和瞭解傳回歐洲，甚至傳回根據中國人的地圖繪製的中國地圖，如羅明堅的中國地圖<sup>(53)</sup>和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但即便如此，由於極西和極東的交往仍然很少，沒有來過中國的廣大歐洲人，甚至生活在印度的歐洲人，對耶穌會士的報告，仍然將信將疑。甚至到了16世紀後期，當印度的耶穌會士聽說東亞還有“契丹”，而這個契丹似乎還有巨大的傳教機會時，他們便派出專人通過中亞去追尋“契丹”，追尋“契丹”與“China”的異同。利瑪竇對這個故事有生動的記述。我們今天仍然能夠讀到這次旅行的主角鄂本篤的旅行記。<sup>(54)</sup>這次旅行不僅證明了當時一般的歐洲人對東亞的瞭解仍然不多，而且也說明了當時從海路來華的葡萄牙人，祇知道“China”，“China”已經是當時歐洲通用的對中國的稱呼。雖然認識還要加深，但傳統的“塞里絲誤解”確實已經在歐洲失去了根基。

歐洲人借助葡萄牙人的活動，逐步正確認識東亞大陸。但由於葡萄牙當時特別是在16世紀上半期，仍然將在東方活動所獲得的資訊視為國家機密，千方百計地封鎖消息，甚至製造假消息，阻止正確的資訊被其他歐洲同胞瞭解，所以葡萄牙人地圖上反映的祇是他們所瞭解的真實情況的一部分。假如沒有這樣的競爭手段的阻礙，歐洲人頭腦中的“塞里絲誤解”的消除，應該還會更早一些。

〔說明：阿曼多·柯爾特桑（Armando Cortesão）和阿維尼諾·特謝拉（Avelino Teixeira da Mota）於1960年開始出版大型葡萄牙歷史地圖集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五卷加上索引卷），彙集了16-17世紀葡人編寫的歷史地圖，加上對作者和地圖集

的介紹、研究，用葡文和英文雙語出版。這一歷史性著述的出版，對本課題的研究有根本性的意義。1987年葡萄牙出版該地圖集的縮影本雖然地圖圖幅是單色的，但附上了Alfredo Pinheiro Marques的補遺，包括1960年該圖冊出版以後發現的新的有關圖幅和1960年以後關於若干圖幅的新研究和新解釋，對使用這一地圖巨著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的重要特點是對該地圖集的利用和分析。這在國內還是第一次，在國際上使用的也不多。當然，該《地圖集》的遲到耽誤了本研究的完成。特此向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致歉。〕

### 【註】

- (1)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 Orient depuis le IVe siècle av. J.-C. jusqu'au XIVe siècle*. Recueillis et traduits par George Coedes. Paris: E. Leroux, 1910. 1977年該書重印時書名略有該動：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es Relatifs a l'Extrême Orient。耿昇漢譯本：戈岱司《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耿昇譯），中華書局，1987年。
- (2) Henry Yule (tran. and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866.
- (3) Notes on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Vol. III, pp. 264-278.
- (4)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65-1993.
- (5) Jaime Cortesão, *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6 v., 1635 p., [28] p. of plates.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es. Lisboa, Livros Horizonte 1975-1981.
- (6) *History of Portuguese Cartography*. 我僅僅得到了第二卷(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Lisboa, Coimbra, 1971).
- (7) Armando Cortesão and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6 vols.; Lisboa, 1960-1962). Reprodução fac-similada da edição de 1960.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7. 本研究中縮略為《地圖集》。
- (8) 伊斯塔赫里《諸國之路》(BGA, 卷1), 頁9-10。伊本·豪卡勒《各地形勝》(BGA, 卷2), 第12節, 基本相同。
- (9) 伊本·豪卡勒《各地形勝》(BGA, 卷2), 頁8-9。
- (10) 伊德里希的地圖見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科學出版社，1976年，頁182-183之間。
- (11) 這個名字又譯為柏朗嘉賓。
- (12) 柏朗嘉賓《柏朗嘉賓蒙古行紀》(貝凱、韓百詩譯注，耿昇漢譯)，中華書局，1985年。
- (13) 柏朗嘉賓，頁160-165。
- (14) 見譯者何高濟的前言，魯布魯克《魯布魯克東行紀》(柔克義譯注，何高濟漢譯)，中華書局，1985年，頁184。
- (15) 魯布魯克，頁254。我這裡對中譯本的譯文稍做修改，將“絲人”改譯為“塞里絲”。*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12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 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 Carpine*, trans. from Latin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ice 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London, MDCCC, pp. 155. Yule (Vol. ii) 指出他是西方學者中第一個將塞里絲與契丹勘同的。
- (16) *The Opus Majus of Roger Bacon*, a translation by Robert Belle Burk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28 (reprint by Thoemmes Press, 2000), p. 387.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魯布魯克，他的著作和他的知識直到16世紀才又被重新發掘出。
- (17)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 by Moule, A. C., & P. Pelliot, London, 1938, vol. I, p.353.
- (18) Marco Polo, *ibid.* vol. I, pp.304, 309, 353.
- (19) 參見陳得芝《中國通史·元時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頁81; 《鄂多立克》。
- (20) 阿曼多·柯爾特桑曾經介紹了1325到1400年期間重要的“泊特覽”地圖, 參見 Armando Cortesão, *History of Portuguese Cartography*, p.38-51。
- (21) 雅依梅·柯爾特桑對阿拉伯人的這種影響有相當肯定的積極評價, 參見《葡萄牙的發現》頁196-197和頁222-223。
- (22) 雖然學界對《地理學》和其中的地圖是否是托勒密的原作有爭論, 但它或者是托勒密的著作或者是托勒密思想的著作, 則沒有多少疑問。參見 Lach, vol. I, book one, pp. 67-68。
- (23)(24) 馬吉多維奇《世界探險史》, 頁149; 頁161。
- (25) 關於胡安·德拉科薩的地圖和“King-Hamy-Huntingdon Chart”的情況, 轉引自 Lach, vol. I, book 1, p. 219.
- (26) 見《地圖集》, vol. I, p.13.
- (27) 《地圖集》, vol. I, 圖9。說明見頁29-31。
- (28) 關於羅德里格斯的材料, 見《地圖集》, vol. I, pp. 79-84 和圖34-36;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ão, London, the Haklyut Society, 1944, "Introduction", 特別是其中的 "The Pilot and Cartographer Francisco Rodrigues" 和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 (29) 《地圖集》, vol. I, pp. 33-34 和圖10。地圖的標題是 "Anonymous-Pedro Reinel, Chart of c.1517"。這裡的“未署名”是因為在現存雷內爾地圖中, 大多數沒有他們的簽名, 但現在學者對它們的製作者已經沒有甚麼疑問了。參見《地圖集》, vol. I, p. 19.
- (30) 《地圖集》, vol. I, pp. 35-36 和圖11。這幅地圖研究史的詳細說明(柯爾特桑)見《地圖集》, vol. I, p. 36。
- (31) 《地圖集》, vol. I, 圖12。
- (32) 分別見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p. 320 和 p.301。
- (33) 下列各圖的名稱及其編號均見《地圖集》, vol. I。圖的名稱是後人加上去的。
- (34) 《地圖集》上這幅圖名稱中的“臺灣”用的是 Formosa。
- (35) 里貝羅的情況見《地圖集》, vol. I, pp. 87-94, "The Cartographer Diogo Ribeiro and his Work"。另外還可以參閱 Monique de La Roncière et 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Les Portulans: Cartes marines du XIII<sup>e</sup> au XVII<sup>e</sup> siècle*, Office du Livre S.A., Fribourg (Suisse) 1984 中對1529年 Diogo Ribeiro 地圖的介紹。
- (36) 《地圖集》, vol. I, 圖37-圖41。第5幅地圖〔圖41〕原先被認為是一幅單獨的圖, 但有些學者認為它實際上是一幅平面球體圖(世界地圖)的一部分。參閱《地圖集》, vol. I, pp. 107-109。後來發現他的另一幅繪製於1530年的世界地圖〔圖523〕, 似乎證明第5幅圖確實是一幅大圖的部分。參見《地圖集》vol. V, pp. 5-6(其中頁5有關於該幅圖的復原設想)。
- (37) Lach (vol. I, book 1, pp. 221-222)轉引注明地圖學家 Kammerer 的說法。Kammerer 的書沒有看到, 但他顯然是將里貝羅與羅德里格斯進行比較。另外, 當時日本還沒有被發現, 當然它的正確位置也不清楚。
- (38) 《地圖集》中的文字太小, 無法清楚閱讀。Lach 在書中(vol. I, book 2, p. 816)引出了一段里貝羅1529年圖上的說明“在這個中國的省份, 人們有許多絲綢、麝香、大黃和瓷器……”這段說明應該就是圖上“中國”字樣下邊的說明。
- (39) 《地圖集》, vol. I, pp. 123-124.
- (40) Lach, vol. I, book one, p. 223.
- (41) 但太平洋中部和美洲的西北和西南沒有包括。從時間上講, 美洲部分地區的忽略, 有些奇怪, 因為其它的地圖中已經涉及到這些地區。參見《地圖集》, vol. I, p. 67。
- (42) 《地圖集》上很難仔細辨認出具體的城市名稱。柯爾特桑曾研究過這些城市名稱, 參見 Cortesão, *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 e XVI* (Lisboa, 1935), vol. II, Plate XVIII. 轉引自 Lach, vol. I, book 2, p. 817.
- (43) Liampo 一詞的辨認, 是根據《澳門圖》的提示。參見《澳門圖》, 頁56-57。
- (44) 迭戈·奧門在不久後的一幅圖上(1561年), 在中國南方標注了“Terra Leucorr”, 可能意指“琉球之地”。這一稱呼很讓人迷惑。參閱 Lach, vol. I, book 2, p. 817.
- (45) 圖上原文為“Formosa”。
- (46) Filippo Bencardino, “China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between the Fif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Review of Culture* (English Edition), No. 34/35, 1998, p. 24.
- (47) 雖然這幅圖上沒有出現“塞里絲誤解”的內容, 但從前面討論過的維利烏的地圖看, 他應該不拒絕那樣的內容。
- (48) 參閱徐寧《李朝後期的天下圖研究》(南京大學申請碩士學位論文, 2002年6月2日)。徐寧考慮漢譯西方世界地圖傳入朝鮮半島與天下圖產生的關係。但當時葡萄牙等歐洲地圖已經在日本落腳生根, 葡萄牙式的日本地圖對朝鮮天下圖的影響, 或許會更加直接。
- (49) “中國”的原文為“Achina”。研究他的地圖集中的其它地名, 他似乎習慣在某些地名前加上“A”, 如“Apersia”(參見圖216)。
- (50) 參考洛佩斯, 1583年的世界圖(圖408)。
- (51) 杜拉多有的中國地圖上的中國名稱為“Reinos da China”, 祇帶有“Liampo”(杜拉多, 1570年, 圖270), 或者沒有中國的大名, 但標注有大字“Camtam”(廣東/廣州)和“Liampo”(杜拉多, 1576年, 圖340)。
- (52) 拉索1592-1594年的地圖上, 珠江口一帶的描寫更詳細, 地名更多(圖383)。
- (53) 參閱: Fernando Sales Lopes, “The Atlante della Cina”. In *Review of Culture*, 1997; Michele Ruggieri, “Four Maps of Southern China”. In *Review of Culture*, 1997.
- (54) 利瑪竇、金尼閣著《利瑪竇中國節記》, 中華書局, 1983年, 第十一章〈契丹與中國——一位耶穌會兄弟的不平凡的遠遊〉。第十二章〈契丹與中國被證明是同一個國家〉。同樣的記載還可以參閱 *The Journey of Benedict Goes from Agra to Cathay*. In Yule, Henry,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866, pp. 529-591.